

是一種智慧型處理與查尋知識紀錄的方式，一種可以提升圖書館從業者「處理」與「查尋」知識紀錄兩大專業能力的方式。

當超級媒體走入圖書館之後，圖書館大門口把關的目錄，型態將有所改變，它不再是一個冷靜的旁觀者，遠遠立在一旁，遙遙指示著館藏資料的位置，它將與所描述的資料串連起來，統統成為知識整體，或者說超級媒體的一部分，它搖身一變，成為一個熱心的指導者，讀者依循線索而查得的，不僅是書目資料，還有作品本身。電腦來臨之後，書目查尋的命中率提高了，超級媒體來臨之後，資料的運用將更為便捷。在館方的管制之下，讀者在查尋過程中，甚至可以逕加「眉批」、「注釋」，或評論文字，參與創作。圖書館從業者自此在界定蒐集、處理、提供服務等主要任務時，範圍必須更擴大，他們還可以担任「超級媒體工程師」，或者將線性資料換為超級媒體(尤其是無版權的作品)，或者將各超級文案串連在一起，這時圖書館勢必更倚重主題分析与索引專家，因為製作、測試、檢討超級媒體中的串連關係，皆是無比重要的工作。

新科技提供圖書館扮演新角色的機會。對於無版權的作品、圖書館大可將其轉換為光學媒體(現階段)或超級媒體(未來)，無論就資料保存或傳佈的觀點而言，「出版者」都是一個相當有意義而且相當有潛力的角色。再者，當超級媒體在圖書館中漸成氣候之際，圖書館仿倣OCLC、RLG等大型書目供應中心的作法，成為(超級媒體)資訊供應中心，也不無可能。

結語

縱然我們身處於「不連續的時代」、未來的變化不能完全根據過去的經驗加以臆測，然回顧主題查尋的觀念，從分類法、標題法到主題用語典(thesaurus)的過程，一步步由線性的方式，過渡到靈活組合的方式，再推想超級媒體取代部分線性作品的說法，也許並非妄言。

再放眼地球資源，書籍紙張之所來自——森林，果真如江上之清風與山間之明月，是造物者的無盡藏，取之不盡，用之不竭嗎？圖書館中脆黃的斷簡殘篇俯拾即是，魯魚豕亥又豈是以保存知識為職志的圖書館從業者所樂見？因此，在書籍之外，另一些生命期更長、功能更多的媒體被開發出來，也是恰如其時。

認識過去，使我們更有靈感與勇氣去面臨未來。圖書館保有人類過去的記憶，同時應用最新科技來提供服務，正是鼓勵我們放眼未來，心懷傳統的最佳媒介，因此，面對迫促的科技脚步，圖書館從業者何妨大胆假設，小心評估，尋求適合的產品，並加以應用，而不失其時，相信對

1.海明威寫「老人與海」時，是否修改了39次？

2.有關茱萸的典故？

3.清劉銘傳經營臺灣時，曾築臺北至基隆間鐵路，中某隧道長11鎖70結，是現今多少長度？

4.碑文上有「林鍾月」的記載，林鍾月係指何月？

5.是否有醫師宣誓公約？

踏破鐵鞋無覓處?!解惑在頁41

參·考·小·檔·案·?!·

參閱
考覽
室組

於人類如何調適傳統與未來，應有重大啟發。

附註

- 雷叔雲小姐係本館編目組西編股前任股長。
- Raymond DeBuse, "So that's a book... advancing technology and the library" *Information Technology and Libraries* 7:1 (March 1988), pp.9-15.
- Katie Blake, "The electronic book" *Library HI TECH* 6:1 (1988), pp.7-11.
- San Jose Mercury News* (Oct. 13, 1988), Sect. 1A-2A.
- John W. Verity and Karen A. Frenkel, "Will Next usher in the software of the future?" *Business Week* (Oct. 24, 1988), p.78.
- Raymond DeBuse*, op. cit., pp.17-18.

中央圖書館往事環憶

蘇瑩輝

國立故宮博物院顧問

一、重慶時期

我入國立中央圖書館服務是在民國31年(西元1942年)的4月初旬，當我持立齋張先生的介函往重慶兩浮支路中圖重慶新厦晉謁館長蔣慰堂先生之時，承他接見，垂詢我的學歷和志學興趣以後，隨即將任用手令交給我於第三天(好像是兒童節的次日)持往白沙總館報到。他並囑咐：「你到白沙後，先將此紙交給特藏組主持人屈翼鵬先生，他會帶你向人事室辦理報到手續以及住宿等事宜。」我辭出後，經向渝館同仁探詢，才知道「白沙」是東川江津縣的屬鎮；而它還在江津的上游，隔日均有西上的小輪船停靠。我至白沙總館報到後，就派在特藏組工作，那時本組連組主任和我與樊漱圃先生共三人，稍後，才來了一位比我還年輕的李思恭君。屈先生早年服務於山東省立圖書館的善本部，那時館長王獻唐先生為著名的金石學家，也是先君的神交友之一。屈主任知道吾家收藏漢、魏碑拓和名家印譜之外，還有歷代泉幣百餘事，遂叫我負責館藏金石拓片的編目和考訂工作，遇到疑難的問題，就向他請示解決。漱圃先生曾在樂山復性書院從山長馬一浮問業，不但精研理學，尤擅詩古文辭，他住杭郡時，常與父執葉葉舟丈(諱銘)過從，因讀葉撰「廣印人傳」，知先君兼事金石傳真畫，故蒙贈詩有「印人一傳已千秋」之句，凡此皆令我至今感念不忘。

我在中圖白沙總館工作不足一年，於31年冬便奉派調往渝館協辦教育部主持之「三全美展」籌委會工作。教部主辦第三屆全國美術展覽會事，遠在民國26年6月即已定案，嗣因抗日戰爭而中止，直到31年12月始假中圖渝館大展覽廳為會場，開始展出，展品計分11類。蔣館長為籌委會常務委員，並兼第三組(主管展品登記、發還等事宜)主任，但他因館務繁忙，有時且在白沙辦公，除了籌委會開常委會議外，經常的組內事務，皆由我代為料理，因此，我和常書鴻(第一組)、徐伯璞(代表劉司長董理二組事務)、李瑞年(第四組)三位主任接觸的機會較多，也因此而認識多位美術家，後來我應聘為國立敦煌藝術研究所考古組的研究員，實亦肇因於此。當我在敦所聘約屆滿時，本應

回渝復職，奈蘭州的國立西北圖書館創設伊始，館長劉國鈞先生商得蔣館長同意，以借調方式於33年8月起，留我在蘭州待了8個月，為該館編審「西北文化」周刊，34年秋，經天水、成都返渝復職。居未久，即偕中圖首批同仁乘輪東下，還都參與圖書清點接收工作，是項清點結束後，我當然恢復在特藏組的任務，此時白沙的善本書，尚未運京。而戰時在滬收購的部分善本，仍存上海鄭西諦處，在民36(1949年)徐、蚌棄守前，我曾奉蔣館長特派三度由京乘「錢塘號」頭等特快車(行李、箱籠均可隨身攜帶)赴滬，提取鄭宅存書，有時須停留一、二日，等候西諦先生將書檢出，陸續點交，方能回京報命，雖每次攜回之數量不多(有時每部書中，只能檢出一、二冊帶歸京館)，固已視同拱璧，而回程在護運珍籍車廂中，其戒懼心情，及今思之，猶有餘悸！

二、遷館來臺

當徐、蚌吃緊，首都感受威脅之際，政府為使國家文化資產安全起見，決將故宮博物院、中央博物院、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之古物及中央圖書館之善本圖書聯合遷運臺灣，原擬分四批運完，結果未批未能運出。我和中圖的昌彼得先生、任闇女士均負責護運善本圖書，同於37年尾參與第二批(和兩院一所文物、同仁同船)專輪離京，翌年元月抵達基隆港，然後接駁臺鐵列車數節，轉運臺中安頓。而全體護運人員則皆暫住入中市合作旅舍。直至國立中央博物圖書館館聯和管理處成立後，我等押運同仁始分別納入聯管處新編制的故博、中博、中圖等組(均直隸教育部)，而古物、圖書則安置於新建庫房中。在中圖第一批及第二批善本裝箱竣事後，蔣館長俱蒞臨下關碼頭，親送我等上船，那時他因精善本圖書皆已運出，遂另乘商船赴臺。稍後，發表特藏組主任屈翼鵬先生為臺灣辦事處主任，為示禮遇起見，請屈主任另乘商船，毋須隨船押運，事後館座似有悔意，因非隨船押運者即不便納入院館押運人員合組之單位，同時翼鵬先生已應臺灣大學傅校長聘約，並無意繼居臺中，故院館聯管處成立後，便改派顧華先生為中圖組主任。

43年張曉峯先生就任教育部長後，除先恢復國立政治

大學研究部外，並恢復中央圖書館建制，請蔣慰堂先生重任館長，將臺中聯管處內之「中圖組」劃出獨立，在臺北市建館，先於教育部旁臺大醫學院大禮堂內辦公，而館藏善本仍留存霧峯鄉之北溝書庫，並聘呂彼得先生為特藏組主任，顧華先生為採訪組主任，任蘭女士為編目組主任。除呂兄留守珍本館藏外，我和任、顧二主任均先後奉調臺北新館，我的職稱是簡聘編纂（隸特藏組），但一度兼秘書工作；直至55年(1966年)10月初應聘往吉隆坡馬來亞大學任教時止。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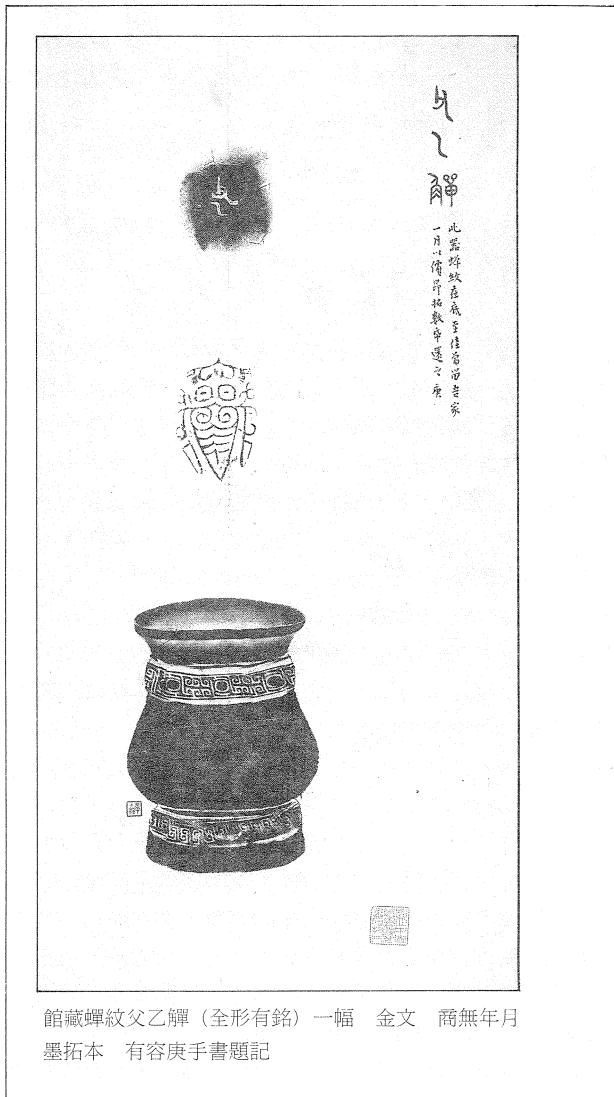
三、前塵瑣憶

綜觀上述我在中圖任職的時間，若併聯管處的5年計算，自以居住寶島(含臺中、臺北)的歲月較長，前後達十有七年之久。就個人的感受(包括受益、求知、興趣)言，值得追憶者，約有下列數項：

(一)因參與「三全美展」籌備事宜，而有度隴西遊，巡禮莫高窟，親炙、觀摩中古繪、塑真蹟之機會。

(二)在初入渝館不久，因蔣館長之介，得識商錫永先生(承祚)，過從既密，方知乃翁藻亭前輩(衍鑾)亦為先君神交友。館藏金文全形(連器銘)拓片六百餘幀之收購，即係錫永由我經手以半贈半售方式歸諸本館者。其中除錫永藏品外，以貞松老人舊藏居多，其上除羅氏藏章外，容希白題記亦有數則。今錫永捐館多年，而藻翁喬梓贈余之墨寶，猶懸壁間，觀物懷人，能不黯然？在渝都時，因慰老、錫永之介而識衛大法師(聚賢)於喬寓，某日衛公約諸友在其寓居晚餐，錫永和我皆座中客，衛寓顏曰「聚賢樓」，某君謂主人曰：額下不可無楹聯。衆推錫永撰聯語，他即席成「有師能衛大法，非賢莫聚斯樓！」一聯，衆皆稱讚不已，妙在將「聚賢樓」與「衛大法師」皆嵌入聯中也。

(三)民國32年多，我經慰老同意應常書鴻、劉衡如(國鈞)兩先生之聘，先後有甘、青之行。越明年，西北科學考察團歷史攷古組(由中研院、教育部、中博院、北大文科研究所合組而成)適在河西展開工作，並於敦煌設工作站，我識向覺明(達)、夏佐銘(籟)、閻伯雅(文儒)三先生，即在此時。該組同仁原意推向氏為組長，他堅辭不就，並說：「我只願做識途老馬，不任組長，否則，我即退出。」衆無奈，改推夏氏任組長，但實際上仍由覺老領隊，經他們的翕力探掘，終於是年11月在敦煌大方盤城發現漢簡纍纍，其中以「酒泉玉門都尉護衆……」一簡最為重要，因而確定西漢玉門關的遺址；洵為該團驚人收獲。當該團由敦城出發的前夕，夏先生曾邀我同行，我因正趕寫敦煌藝術研究所的研究報告，又因氣候酷寒，耐不住160公里的戈壁旅行，我便喪失了一次增加考古見聞的機會，至



館藏蟬紋父乙罍（全形有銘）一幅 金文 商無年月
墨拓本 有容庚手書題記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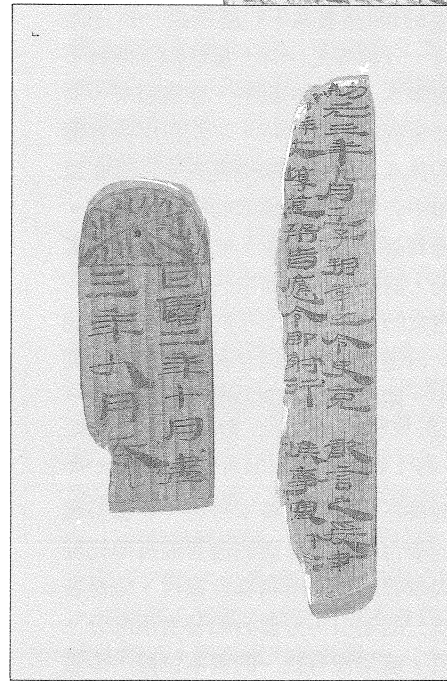
今引為憾事。然而，所幸該團掘得的古物(包括漢簡)運回敦煌時，我和研究所的同仁們能夠先觀為快！並且，夏先生先把「護衆簡」的照片沖印一幀給我，允在拙著「敦煌學概要」卷首發表，盛情可感。

(四)民國33年秋，是我入蘭州國立西北圖書館服務的一年，教育部將購自故蔡善元氏之漢簡30枚撥交該館保存，此宗簡牘，係居延附近出土，有字者28簡；其中兩面有字者計七簡，且有一簡為竹質；另二簡則一無字，一漫漶。各簡存年號者，有宣、元、成、哀、平諸朝。我曾撰寫簡要說明，在蘭垣公開展覽一次。籌備展出期間，夏佐銘先生亦常來館參觀，他和我皆謄錄各簡全文，藏諸行篋。爾後劉館長編有「館藏漢簡簡目」，在蘭州西北日報副刊發表。據劉館長稱：「是項漢簡，裘氏自言得諸回疆，然考

簡上記載(有西漢宣、元諸帝年號)，其為居延附近所出，殆無疑義。」上項簡牘於抗戰勝利前夕，經蔣慰堂先生之呈請，遂由教育部撥交中央圖書館典藏，原擬由我在西北館任期屆滿時親自攜往陪都重慶，嗣因欲於還都時在京館展覽，忽提前由蘭空運中圖渝館。迨38年中圖善本文物遷臺後，我曾寫「中央圖書館所藏漢簡中的新史料」一文，刊載於臺北出版的大陸雜誌第三卷第一期，聊供治漢史者之參考。

(五)抗戰期間運存美京國會圖書館的居延漢簡一萬餘枚(西北科學考察團發掘物)和北平圖書館所藏之善本書一百餘箱，自袁守和先生(前北平圖書館館長，時在國會圖書館工作)逝世後，中圖蔣館長鑒於存書無人照料，遂呈請教育部建議政府向美交涉取回，閻部長振興先生亦表贊成，於是一面由教部諮請外交部向美國國務院交涉，一面由蔣館長致函國會圖書館提出請求，不久漢簡與善本圖書均運回臺北，前者歸中央研究院接收，後者由教育部交與中央圖書館保管。當中研院於55年(1966年)元月邀約有關單位在南港歷史語言研究所啓箱點驗時，蔣館長公冗未克出席，臨時派我代表參與，驚喜之餘，竊幸22年前能目觀西科團新發現之敦煌漢簡，22年後又得觀賞居延漢簡，庸非與簡牘有緣？實三生幸事！此次點驗工作，自1月27日起，共歷3天。我等啓箱點驗之時，距離這批簡牘的出土，已有36個年頭，因為發現地在居延海以南(額濟納河流域)，故晚近學人稱之為「居延漢簡」，以別於「敦煌漢簡」、「羅布淖爾漢簡」和內郡的「武威漢簡」。談到今藏南港中央研究院的這批漢簡的價值，可說是多方面的。例如：第七箱中的「廣地南部候兵物冊」共計78簡(其中一簡無字)，為東漢和帝永元5年至7年(西元93年至95年)所寫，用麻繩兩道編連在一齊，有如竹簾；保存着簡編的原始形態，乃現存世界上中文最古的書。木簡長度有短至13或14公分，寬亦1公分至1公分半。但亦有潤度為3公分至7公分，長短不等者。寫字行數亦不等，有的字較小；行數亦多。其較短之簡，上面並有一個長方的孔穴，作為放置封泥加蓋印章之用，並且還有橫的刻劃，作為以繩繫牢之用。凡此種種，可與古書所記載簡牘制度互相印證。至於簡牘上的書體，多「上承篆書，下接章草，惟係邊徼急就之書，頗多譌略。今人獲此，亦可以知書體之變遷，窺簡牘之體式」(用羅叔言語)。足為書學環寶。這批居延簡牘，經點驗後歸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保存。在此宗文物(含善本圖書)運抵國門時，我曾草就「迎國寶，頌中興」一文，在中央日報副刊發表，以誌其盛！

▷中研院藏居延漢簡



◁中央圖書館藏居延漢簡

四、結語

頃因中圖新廈落成後，館訊將刊「玄覽憶舊」專欄，由曾在館服務多年的同仁執筆，用以緬懷既往，策勵來茲，意至善也，承徵文及於下走，喜媿交併，媿者，不佞服務於中央圖書館，前後將25年，而白沙，而重慶，而南京，而臺中，而臺北；閱事雖多而績效極少。喜者，因歷任館長之提攜、獎勵，前後同仁之切磋、勸勉，而能坐擁書城，置身學林，攀交並世耆碩，增益學養、新知，誠屬三生幸事。此文匆遽草成，所述叵中肯要，僅求塞編者之責，不足登大雅之堂。

戊辰小陽月，於臺北外雙谿